

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僧佑《出三藏记集》

路 林

属于两大不同体系的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由于佛教文化的传播而开始了中印文化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佛教经录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留下的文化宝藏。

一

佛教文化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人四处传教,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扩散到中亚细亚各国。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传入我国,有记载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佛教在最初的传播中,是以佛主释迦牟尼阐发宏微、讲经说教进行的。在释迦牟尼去世后不久,释氏弟子以会议的方式对他的说教进行集结,形成了所谓“经”、“律”、“论”三藏,这就是佛教经典的最初形态。约在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原典开始用文字记录在贝叶纸上向国外传播。在早期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僧人既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又充当了这种传教活动的传播媒介。当贝叶经典出现后,佛教文化借助文献媒介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佛经成为推动佛教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而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国度的不同,传教僧人开始担负起传译佛经、阐发经义的使命。佛教文化借助僧人的传教和译经活动,开始能够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里流传、弘扬。

译经活动与其说是佛经传译的过程,不如说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在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是伴随着佛经的译介展开的。译经活动,从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了隋唐时代臻于极盛,宋以后这种活动趋渐余绪尾声。与译经活动同过程,佛教文化开始播于中土大地,寺院的发展,译经的增多,寺院经济的雄厚,学派的出现,以至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大规模的译经、写经活动,佛教诸宗派的建立,既表现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又表现为佛教文化发展的整合过程。隋唐佛教文化的发展,完成了中国佛教形成建立的基础。

佛教文化在中土大地的传播,佛经译本和撰述的大量增加,约在魏晋时代开始了汉译佛经的经录编撰。隋以后,封建统治者组织大规模写经,“经录”亦随之以官修形式发展起来。南北朝时经录中有专录藏经的,隋唐时《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等几种经录则专列了《入藏录》卷。《入藏录》为藏经的编修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就是根据《开元释教录》雕印成书的。大藏经的修成,标志着印度佛教文化东传的累累硕果。从译经→经录→大藏经,这一进程表现了经录在我国佛教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张曼涛认为:“中国佛教第一个伟大的创举,不是研经学教,唱宗立派,或建寺造像,而是懂得自东汉

以来,记录译人所译述之经目,整理散失之译著,使得后人得能循目收集,编成大藏”,佛教经录“为中国佛教带来了立根于世的基础”。①

二

我国最早的译经活动,据确切记载,始于东汉恒帝时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汉魏时期,是我国佛经传译草创初起阶段,也是佛教文化东传中土的早期年代。东汉译经53部、73卷,三国译经约40多部,近30卷;它们大多是大部佛经的节本。其时佛经传译多为私译,而且往往全凭口授传经,即由外僧背诵讲经,经过“传言”、“笔受”成汉文,再进行修饰。有道:“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园共凿,金石难和……咫尺千里,覩面难通。”②可见早期的译经之难。为此译经传言者既要兼通华梵两种语言,又要对经典理解透彻。而当时这样的人才是不多的,汉魏著名译僧有安世高、支娄迦谶、朱士行、支谦、康僧会等,其中朱士行是我国第一个西行求经者。由于口授译经,无原本可资校对,加以传言水平有高有低,译出经典是否可靠就值得怀疑。而且译经又属个人活动,外僧能背诵什么经就译什么经,或想译什么经就译什么经,不能有选择有计划地加以译介。故有:“泊章和以降,经出盖阙。良由梵文虽至,缘运或殊,有译乃出,无译乃隐。”③可见译经活动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关系重大。由于这些原因,给后来的佛经整理、经录编撰留下了不少困难,正如道安所说:“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宁康,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④也正因为如此,编撰经录的意义就更大了,它不仅是对汉译佛经的编次整理,也为佛教经典的流传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佛教文化传入我国,到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个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译场,佛经传译活动也从私译转入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集体翻译。其时译场传译与讲习相结合,译主不但译经而且讲经。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于长大寺集四方译学沙门二千人”,译场的出现无疑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功绩卓著。这一时期由于去天竺求经者日多,从陆路或海路传入不少梵本,便有条件按梵本翻译,而不象过去多以于阗、月氏、龟兹等胡本为据;而且梵本不断传入,数量较多,先译哪种有了选择余地,事实上从鸠摩罗什开始,译经已具有一定系统性。在鸠摩罗什之前,译经一般不署名,这给后来经录编撰增加了很多麻烦,道安撰录在确定译者方面曾花了不少功夫;罗什提倡译者署名以负其责,使后人易于鉴别和搜寻。

两晋时期,由于玄学性佛教的勃兴和统治者的提倡,译经数量较汉魏大增,佛教大小、空有各个体系的经典,几乎都在这个时期相继译出。与此同时,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研究的“义学沙门”,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佛教“般若”学勃然兴起。两晋佛教文化的传播,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佛教那种对神仙方术的依附,开始走上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的发展道路,为学派竞起的南北朝佛教,直接作出了文献、思想上的准备。⑤两晋一百五十多年中,共译经250来部、近1300卷。其时著名僧人有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等人,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经数量最多者,共译经155部、311卷,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⑥道安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僧,他总结了译经“五失三不易”原则,始创注经,“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⑦这种形式对佛教文化的传播的帮助,意义显见、影响深远。此外道安整理了新旧译经,撰成《综理众经目录》,对汉译佛经的流传作出了卓有价值的研究。被誉为“古代四大译师”之一的罗什,译经规模隆重而宏大,态度严肃而审慎,共译经63部294卷。他通过众多佛

经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教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六朝中国佛教思想文化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南北朝时，由于国分两半，佛教也随之分为其有不同特点的南北两系。由于般若学与玄学思想接近，而且不少“义学”者流兼通儒道，南朝佛教偏重义理，玄学性佛教、“义学”清谈之风推动了南方佛教文化的传播。北朝佛教，由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没有儒道传统，故比较重视修习禅定，偏重禅学，与此同时还大肆建寺度僧、开凿石窟，而对讲经说法不重视。因此佛经传译、撰述，南朝较北朝兴盛。其间南朝共译经387部、1963卷（一说563部、1084卷），^⑥而且佛教经典，大小二乘，空有、性相，经、律、论典，应有尽有。有道是“翻传并出，至于广部，绝后超前，即见敷扬，联耀惟远。”^⑦北朝译经较少，共127部，395卷（一说105部、355卷），其中北魏历时较长，译经较多，有87部、302卷。但北朝境内佛经数量仍不少，“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⑧南北朝时译僧众多，著名的有求那跋摩、僧伽婆罗、真谛、菩提流支。真谛也是古代“四大译师”之一，据记载他二十三年中共译“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其范围包括经、律、论三藏。真谛所传主要是大乘瑜伽行学派，他所译《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虽然王朝变迁频繁，但思想文化极为活跃繁荣。这一时期是继两晋十六国后佛教文化传播取得大发展的年代，也是形成佛教诸学派和开始认真研究大量汉译佛经的年代，^⑨不少学者用玄学思想研究、撰写了许多注经、经序等著述，光收入《大藏经》中的各类著述有二十多部，^⑩包括宝亮《大般涅槃经集解》、法云《法华经义记》、僧佑《弘明集》、《释迦谱》、宝唱《经律异相》、《比丘尼传》和慧皎《高僧传》等，其中《弘明集》共收入各种有关佛教的论文、书札等百余篇，“皆阐扬佛教之文”。僧佑自序：“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在汉译佛经的研究中，当时的经录编撰也是一个重要部分。由于经录的成就，它们被载入佛教全书《大藏经》中，成为中国佛教典籍的重要内容。

三

译经活动对佛教文化的传播，无疑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随着译经的增多，经录出现势所必然，特别是因为道安、罗什以前，“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⑪长此以往，不利于汉译佛经的流传、搜寻和鉴定，不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我国最早的经录，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为两晋之间的《古录》（《历代三宝记》所载朱士行《汉录》，经考证为后人伪作，不足信，故仍以《古录》为最早），其后还有《旧录》、《别录》，但都已早佚，无从了解。现知比较详细的早期经录，是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道安所撰《综理众经目录》（安录），它大体保存在僧佑《出三藏记集》中。僧佑曾道：“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引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⑫《安录》一卷，首先以年代编次译经，使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轨迹和诸家派别；而且其中失译者、摘译者别自为篇，以译书的性质别分，使得眉目一清。道安还对译经的真伪、年代进行了考证，态度严谨认真，为后世留下了较为可靠的译经资料。再者道安将注经等撰述别自为部，不与译经相混，以此反映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面。道安撰录，既是整理汉译佛经，更是弘扬佛法的重要活动，也为后世经录编撰提供了榜样，“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⑬

道安之后经录渐多，内容形式也各有不同。有专录一地的，如道流、竺道祖《河西经录目》（凉录）；有专录一代的，如竺道祖《汉录》、道流和竺道祖《魏世经录》、《晋世杂录》；

有通录古今的,如佚名《众经都录》、《众经别录》和王宗《众经目录》;还有专录藏经的,如刘勰《定林寺藏经录》、弘充《释弘充录》等,^⑩可见当时经录编撰之盛。其中齐初佚名撰《众经别录》收录完备,体例精善,《出三藏记集》载其收录译经1089部、2593卷;该录从教义上分大乘、小乘、不判乘,从形式上分存、疑、阙,从体裁上分首创经、律、论、数,全录据此分成10部,在当时可谓精细完善。“俾经、律、数、论各有定据,真伪完阙,不从含混。……类例之善,实为空前所未有。”^⑪但由于早佚,我们只能从《历代三宝记》转而记载中了解大致轮廓。

现存最早的经录是梁武帝时的《出三藏记集》,它“遥继安录,近接别录,囊括一切经录而集大成者,”是当时汉译佛经及其它撰述整理研究的杰作。僧佑在自序中曰:“原夫经出西城,远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逐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经比肩,而莫测传法古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这显然对弘扬佛法不利,因此“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佑……于是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这里说明了编撰《出三藏记集》的原因。

《出三藏记集》是僧佑于梁武帝天监四年至十四年间编撰的,在此之前他曾集经藏于定林寺,故有“初,佑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⑫《出三藏记集》15卷共分四部分:第一卷“撰缘记”共五篇,其中前三篇“集三藏缘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经》出入藏记”,叙述了印度佛经集结“三藏”的经过,得以从中了解佛教文化的源流;后二篇为“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和“前后出经异记”,用来说明佛经的传播翻译情况。“缘记”部分有些类似古代目录学的小序,用以说明学术源流。第二至第五卷“铨名录”,著录自东汉至梁初译出的经、律、论共2162部、4328卷,其中疑、伪经目约40多部、50多卷,提供了佛教文化东传的原始译经记录(由于当时南北阻隔,北朝译经没有得到较全的反映)。《名录》(即历代译经名目)分十二部,即:新集撰出经记录第一,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新集表序四部律录第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第四,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第五,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第六,新集安公中异经录第七,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八,新集抄经录第九,新集安公疑经录第十,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十一,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十二。除采入《安录》原有类目外,实际新增《异出经录》、《四部律录》、《抄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四部。其中《四部律录》全录佛律,因为僧佑本是律宗,故特立律部。在译经编次上,《三藏集》并没有严格按朝代划分,致使无从了解某代有多少译籍的全貌;而且不分大小乘经律论,不分译典的正本与别抄,殊类混录,这就没有突破道安陈例,而且没有注意摄入《众经别录》按教义、体裁分类的体例(尽管《三藏集》对此有记叙),致使“小、大(乘)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实为《三藏集》编撰之遗憾。然而尽管如此,“自尔(道安)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寄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佑,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⑬这是因为尽管《名录》部分基本上采用了《安录》体例和格局,但《安录》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循空追求,困于难了。……众录杂经,包集逸异,名多重复,迭相散紊。”^⑭而《三藏集》纠正了这些缺陷,删除了重复记载的经名(此系由一经多名,误为不同的译本引起的);叙列经籍的全称;标明卷数,注明《三藏集》与其他经录(如《旧录》、《别录》)在记载上的同异,这就较《安录》进了一大步。《三藏集》“颇近可观”之处,还在于僧佑始创

了“缘记”、“经序”和“列传”三体，为佛经目录学奠定了基础。《出三藏记集》第六至第十二卷“总经序”，收载自《四十二章经序》（《四十二章经》，经考证为晋人伪作，非汉代译经，此属僧佑考证未精之处），至《法集杂记铭目录序》等各种佛经前序、后记一百二十篇，包括僧佑自撰《弘明集》序和篇目，这是《出三藏记集》最具特色的内容，是研究早期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第一手史料。该部分实际上起了古代目录学中的解题作用。用现成的序跋作为解题之用，实属僧佑首创。后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继承发扬了这种体例，清代朱彝尊《经义考》、章学诚《史籍考》、谢启昆《小学考》等则是这种体例的广泛实践，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一大流派。第十三至十五卷“述列传”，编撰东汉至宋齐间著名译师、高僧三十二人，有安世高，支谶、竺法护、鸠摩罗什、道安、慧远等，此部分也是《出三藏记集》颇具特色的内容。透过这些译师、高僧的履历可以看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轨迹。从内容篇幅份量来看，《出三藏记集》与其说是佛经目录，不如说是经序、僧传等撰述汇集；然而这些经序、僧传的编撰使命，又是与《名录》部分相配合，二者相互辉映，使《出三藏记集》增色不少。由于这种颇有价值的编撰内容，保存了不少早期佛教文化传播发展史料，后人著作多有采入，如稍后的梁·慧皎《高僧传》就吸收有《出三藏记集》列传部分的内容，最为可观的是清·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时采入《出三藏记集》经序部分全部七卷内容。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出三藏记集》中著录了大量早期译经和撰述，后代经录编撰中都采入此录内容。隋唐以后经录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出三藏记集》是佛经目录学早期成就的典范。将缘记、名录、经序、列传等部分互为辉映起来的编撰方式，恰是僧佑根据译经文献特点并结合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创造的。它既是“义学”者流、特别是僧佑兼通佛儒文化于一体的产物，又是古代中印交流中文化整合的必然结果。

在印刷术尚未出现之前，书籍得来尚属不易的年代，《出三藏记集》实际上直接传播了佛教文化。

注释：

① 张曼涛《佛教目录学述要·编辑旨趣》，大乘文化出版社。

②③⑥⑬⑱ 慧皎《高僧传》。

④ 转引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篇七。

⑤⑦⑨⑩ 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

⑧ 前为《大唐内典录》统计数，后为《开元释教录》统计数，引自郭朋著。

⑪ 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⑫ 根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统计，南北朝佛教各类撰述为二十二部。

⑬ 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

⑮⑳ 道宣《众经目录》。

⑯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位置》，载《佛教目录学述要》篇二。

⑰⑱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

㉑ 转引自陈士强《〈大藏经〉十五家经录平议》，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